

黨史資料

一九五三年
第七期

內部參考
不得外傳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黨史資料

一九五三年
第七期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 十二月出版 •

「黨史資料」徵稿簡則

(一) 本刊出版的目的是爲着保存和積累黨史資料，便於黨內幹部研究黨史的參考。

(二) 本刊包括下列內容：

甲、有關黨在各時期、各地區革命鬥爭的原始資料，身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

乙、黨校教材和研究工作者的著述；

丙、傳記；

丁、有關黨史研究工作的通信。

以上取材範圍均以有關全黨或一個地區的全局者爲限。

(三) 希望一切熟悉我黨我軍歷史的同志爲本刊踴躍投稿。來稿經採用者均酌致稿酬。

目錄

傳記(四).....一

——鄧子恢、葉劍英、李富春、羅榮桓

中國共產黨的初期革命活動.....五

葛薩廖夫著
張永瑛、趙一鶴校

三二〇反革命政變真相.....四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前後後.....六

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編

西安事變紀實.....三七

李木菴

補正.....一七

「黨史資料」一九五三年第一期至第七期篇目索引.....一〇

傳記(四)

編者按：下面是繼本刊第六期發表的又四篇黨中央負責同志的小傳，以稿件收到先後爲發表次序。

鄧子恢

鄧子恢（生於一八九五年），中國的政治活動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在福建省龍岩縣發展黨的組織。一九二八年領導當地農民起義。以後又到福建省的上杭縣和永定縣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運動。一九二九年任閩西地區黨組織的書記。不久毛澤東和朱德所率領的中國紅軍第四軍到了福建西部，得到他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張鼎丞的幫助，開闢了福建西部七縣的革命根據地，並在一九三〇年成立了閩西工農民主政府，他被選爲政府的主席。一九三一年調福建東北部做地下黨工作，後又到福建南部領導游擊隊工作。同年，他被選爲中華工農民主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財政人民委員。一九三二年他又被任命爲中華工農民主共和國中央政府財政部副部長。紅軍主力長征後，他奉命留守福建西南部，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在國民黨軍無數次進攻下，他和譚震林、張鼎丞等共同領導當地農民進行了極其艱苦的三年鬥爭，並保存了自己的武力。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歷任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新四軍第四師政治委員，對豫皖蘇邊境解放區的創造有卓越貢獻。在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爲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一九四六年以後的第

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先後担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書記兼華中軍區政治委員及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兼華東軍區副政治委員，協助饒漱石、陳毅等領導蘇北和山東地區農民進行土地改革與解放戰爭，獲得很大成績。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現改為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並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

葉劍英

葉劍英（生於一八九八年），中國的軍事家和政治活動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他積極從事革命軍事活動，參加過在廣東廣西的革命戰役和北伐戰爭，歷任軍參謀長、師長等職。一九二七年九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十二月率領所部教導團參加廣州起義，為起義軍主要指揮者之一。一九三二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一九三二年兼任中華工農民主共和國首都瑞金的衛戍司令員。其後又調任閩贛及福建軍區司令員。一九三四年參加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途中，他積極地擁護和參加黨中央克服叛徒張國燾陰謀分裂黨和紅軍的鬥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期間，任第八路軍參謀長，並曾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參與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工作。一九四五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日本投降後，他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共代表之一，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做了很多工作。一九四六年後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担任人民革命軍

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後，任北京市的第一任市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被選爲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現改爲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和華南分局第一書記。一九五三年五月代理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

李 富 春

李富春（生於一九〇〇年），中國的政治活動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一九年以半工半讀方式留學法國。一九二二年在法國與周恩來等發起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爲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的領導者之一。一九二五年一月赴蘇聯學習，同年七月回國參加北伐戰爭，任北伐軍第二軍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內堅持地下的革命工作，歷任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代理書記、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代理書記、中共臨時中央局軍事部部長等職。一九三一年年底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江西省委員會書記。在一九三四年紅軍長征中，歷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第三軍團政治委員、陝甘支隊第二縱隊政治委員等職。紅軍長征抵達陝北後，任中共陝甘寧省委員會書記。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後，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等職。在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爲中央委員會委員。在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幫的人民解放戰爭中，任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參加領導解放東北的鬥爭。東北解放後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〇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五三年並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

羅榮桓

羅榮桓（生於一九〇二年），中國的政治活動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在湖北省南部通城領導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並參加工農革命軍第一軍政治工作。一九三〇年任紅軍第四軍政治委員。一九三一年任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以後調任第八軍團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他與長征二萬五千里的紅軍一起到達陝北。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八年任該師政治委員並代理師長。一九三九年率部挺進山東，參加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領導工作。一九四三年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山東分局書記。在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先後任東北人民解放軍政治委員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第一政治委員。他和林彪在一起領導第四野戰軍消滅了盤據東北的國民黨匪軍，又參加了解放天津和北京的戰役，並繼續南下解放了包括海南島在內的中南各省。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一九五〇年起並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幹部管理部部長。

中國共產黨的初期革命活動

葛薩廖夫 著
張誠譯
徐永瑛、趙一鶴校

編者按：本文原名「中國共產黨簡史」，寫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作者是當時參加中國革命活動的一個外國人。本文對中國共產黨的初期革命活動（從一九二〇年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開始以前止），提供了有價值的史料，並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中國革命運動的觀測和意見。這些觀測和意見並不完全正確，如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缺乏認識即是一例。本文過去有過一種中譯本，編在北洋軍閥張作霖於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所謂「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裏，譯文非常拙劣，且有歪曲原意處。這次翻譯是根據英文本，一些顯然誤記的事件，年月已經訂正，沒有史料價值的地方均經刪略，文中的小標題也是譯者加的。

兩三年來，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有很大的進展，極廣泛地吸引了大量中國人民羣衆參加。這個運動具有很好的組織，並且對自己提出了鮮明的課題。這些課題總起來說如下：

一、中國民族的解放。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首先驅除帝國主義。

二、國家的統一和鞏固。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向國內敵人——軍閥進行鬥爭。

這兩個口號，在三年前，不僅大多數中國人民不知道，連社會中最先進的階級也不知道，現在却成了中國人民全體的財產了。這是一小羣人所組成的中國共產黨艱苦工作的結果。我們把它叫做「一小羣人」，是因爲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間，中國共產黨黨員還不到一千人，加上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共也只三千人。直到一九二五年，黨員人數才增加十倍，一九二六年有了三萬黨員。

但是，現在和過去一樣，衡量中國共產黨的標準不是數量，而是質量，是它的精神力量 and 影響。

中國是個農業國家，文化非常落後。在這種國度裏，這樣一個堅實的組織擁有三萬個組織好、紀律嚴、有完全覺悟的成員，儘管只佔全體中國人民中的極少數，却是能够起決定作用的，因為他們有着明確的綱領，這個綱領不僅提供了當前進行鬥爭的計劃，還指出了未來的美景。

西方的革命已經多少遲滯下來了，歐洲是如此，美洲不必說了。資本主義雖然沒有絕對穩定，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它已經推遲了自身的崩潰。可是歷史有了一個前例，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業國家也能成功（蘇聯），中國目前在某些方面正經歷着與俄國一九〇五年相類似的時代，因此我們相信，在幾年以內它能够成爲第二個工農掌握政權的國家。但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有持久不懈的工作和鬥爭。由於中國共產黨所吸收到的國際主義的精神和實質超過任何其他黨派，它無疑地會站在鬥爭的前列來領導羣衆。歐美大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代表跑來奴役中國，這種事實，已經逼得世界無產階級和某些國家的共產黨來研究中國問題，來切實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首先，這種援助一定可以從俄國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蘇俄共產黨那裏得到，而且已經得到了。

偉大的俄國工人農民羣衆不僅應當熟悉偉大的中國人民羣衆的鬥爭，並且應當知道誰站在這個鬥爭的前列，誰是領導者。換句話說，他們應當知道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

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一屆共產國際大會上曾經注意到，要推進世界革命運動，必須充分注意和大力支持英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發展。本文便是要用事實來幫助我們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成就是屬於那一類型的。這些成就確實是非常偉大。如果中國共產黨繼續這樣做去，那末我們可

以肯定的說，它就會成爲中國無產階級的忠實領導者和共產國際的優秀支部。

要把全部中國革命運動歷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包羅在一篇短文裏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歷史也是這樣），但是只要它能幫助對這問題有興趣的同志找到進一步研究的途徑，我的任務便可以算是完成了。

本文是完全根據中文材料寫成的。作者是完全不懂中文的，因此遇到許多困難，而且毫無疑問，本文中的缺點是不免的。如蒙指出，作者將十分感激。

中國初期的工人運動

十年以前，中國簡直沒有可以作爲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基礎的任何萌芽。所謂「簡直沒有萌芽」只是指當時還沒有一個有組織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同志的團體，可以在將來成爲創立一個新型的羣衆組織的核心。我們所以提到這個事實，是因爲中國不會有過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能從它的黨員裏面分出一批最忠於革命事業的人來（這種現象在歐美一些國家裏是發生過的）。中國那時當然有革命者，不過他們的思想距離馬克思主義是很遠的。他們是孫中山的信徒或無政府主義者。也有一些相信社會主義的人物。然而，當時的中國也還不難發現那些替中國共產黨奠基的人們。也有一些個別的著名革命者（一般都是年老的，也有些年青的），他們那時已經對馬克思主義發生了興趣，並且用很多功夫進行研究。但是雖然許多革命者都有自己的信仰，可是他們之間沒有一個（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是有實際行動綱領的，他們也沒有可以吸引和組織羣衆的口號。

中國捲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漩渦，大戰也就在這方面發生了作用。它在中國產生了下列的後果：

一、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放棄對中國的干涉來應付他們自己內部的事務，結果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得到了發展。過去在中國佔次等地位的日美兩國也就因此能够擴張他們的勢力範圍；

二、同樣的原因使中國的民族資本和民族工業（工廠）大量擴張，日美資本也躍進一大步；

三、對於我們說來更重要的是，中國民族資本和外國（美、日）資本發展的結果，中國民族工業也大量發展起來。原因是英、法、德各國都不能把像從前那樣多的必需品供給中國市場了，這種物品便開始由中國工廠製造；

四、伴隨着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也相應發展起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中國工人數目增加了很多。他們在工廠裏受到日、英管理員和工頭的壓迫。工廠裏的男女中國工人也就直接和奴役了他們的國家幾十年的敵人會了面。大戰結束之後，在戰勝國掠奪戰敗國的凡爾賽和會裏，中國是一個戰勝國，要求主持正義。她的代表要求歸還原先被德國佔領，後來由於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落在日英「盟國」手中的山東、青島、威海衛及其他地方。可是凡爾賽會議上帝國主義列強根本不替被奴役的中國着想，只顧保護自己的利益。這誠然不是中國第一次受到損害，但是這一次却使她感到特別痛苦。中國人民中的先進羣衆尤其是城市居民，都有這種感覺。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凡爾賽會議精神和物質上對中國的損害，是中國的一九一九年的標誌。這兩件事是極重要的，真正的革命者適當地運用了這兩件事。他們參加了（但只是以個人身份）共產主義運動來進行未來的共產黨的小組的組織工作。那時有許多研究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革命者。他們只是從事研究的，他們並不進行鼓動。辛亥革命前的革命運動，後來還是存在的，但都只有極少數的羣衆參加，除了知識分子之

外多半只是游民無產者，因為產業工人還沒有登上政治舞台。

不錯，遠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間中國工人運動已經開始，可是並沒有純粹的工人組織，都不過是些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 and 政客的團體。這些團體裏的政客是中國資產階級和一般有產階級的代表。資產階級、城市人民和地主們很關心這種組織的存在。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利用這些組織來攫取國家議會的選票。資產階級通過政客欺騙工會羣衆說：「中國是個共和國。每個公民都有議員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人人都有權担任政府的職位。爲了享受這一切的幸福，就必須組織起來，把好人選到議會去。」每一個政客都組織一個工會，工會有需要的時候他就給它一些幫助，這樣來吸收一些人使他們將來必然投票選舉他們的主子。這些政客們還答應全體會員（包括手工業工人、店主、游民無產者等）說，他們如果能把某某人選進議會，他們就可以得到各種職位。

以上就是中國早期的工人運動的特點。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和對中國發生的影響，使中國工人運動的面貌和方向都改變了。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間開始的工人運動逐漸消滅了，代之而起的是在無產階級包括產業工人集中地區出現的真正的工人組織。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中國就有了鐵路。外國資本家在那時就留意中國的鐵路，他們需用鐵路來吮吸中國的富源如原料之類，同時輸入高價的製造品。

這樣，鐵路工人就成爲中國資格最老的無產階級。當吳佩孚夢想當一個武力統一中國的英雄時，他就不得不處心積慮地拉攏鐵路工人。他允許京漢鐵路工人組織工會，甚至於給他們某些組織上的幫助。他想把鐵路工人變成他的同盟者。他也懂得勞資間的經濟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當然，他不承認政治鬥爭的可能性，也不允許有這種鬥爭。在工人們自己起來積極鬥爭來創立工會組織之前，他却要標榜他是贊成工會組織的。

可是大戰和大戰的結局所造成的一些經濟情況，使中國工人感到生活困難。生活費用增漲，工資購買力降低，結果，一九二三年京漢鐵路爆發了第一次罷工。起初罷工是純屬經濟性質的，後來却帶上了政治性質。這是值得詳細敘說一下的。

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漢鐵路工人對管理當局提出幾項經濟性的要求。罷工的時間正是全路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日子。召開大會曾經得到吳佩孚的允許。可是，在路局拒絕了工人正當的經濟要求，工人和資方發生衝突之後，吳佩孚便認為必須保護資本家的利益，並且違反諾言，禁止召開大會。這個禁令當然不能成為吳佩孚和支持他的那些資本家對工人們的直接挑釁。因為他們明明知道工人會認為這是挑釁，而舉行政治性的罷工，他們便可以按軍事戒嚴令採取嚴厲措施對付工人。事態的發展符合了他們的期望。禁止大會召開的命令和資本家對工人正當要求的堅決拒絕造成了緊張的空氣，工人果然提出了幾項政治性質的要求。於是，吳佩孚不但鎮壓了罷工，而且封閉了京漢鐵路全綫上的各工會組織，逮捕了所有的工人領袖。其中最積極的被槍殺了，還有許多被監禁起來。京漢鐵路工會是當時最強有力的羣衆組織，所以這次的鎮壓對工人運動是個致命的打擊。但是罷工本身並沒有好的組織性，一切措施事先籌劃得不够。結果是工人幾乎沒有什麼反抗，罷工就被鎮壓了。然而，這次失敗的教訓是有它的效果的，因為從這時起大家更注意工人運動，工人們覺察到組織的薄弱首先應當由他們自己負責。

在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組織真正的工會的時候，甚至在工人方面還遇到某些抵抗。這主要是由於那時工人們並不十分了解他們應該完成什麼任務，他們對每一個來自外界的建議都表示懷疑。因為共產黨員多半和工業沒有聯繫，他們也就把黨員當作外人。同時工人們還牢記着過去那為收集選票而組成的工會的教訓。然而這些困難並沒有阻擋住共產黨人，他們在工人羣衆中繼續

不懈地進行鼓動，對工人解釋組織工會的重要。宣傳工作終於發生了效果。工人羣衆逐漸明瞭了並終於全部接受了工會的意義。做這種工作的只有中國共產黨，雖然缺點不少，共產黨却獲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被壓迫國家如朝鮮、菲律賓、印度等都掀起了强有力的民族解放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特別有力地在中國全面展開，中國確實成了所有這一切運動的中心。這個現象是不難理解的。因爲上面提到的那些國家都百分之百地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受奴役了。換句話說，他們都成了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中國所受的壓迫雖然並不比這些國家輕，但作爲一個國家，她仍然保持了獨立。中國不是殖民地。她通常被稱爲「半殖民地」。這種情況雖然並不絲毫減輕中國人民實際上的困苦，却在某種範圍內便利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這個道理很明顯，不需要特別解釋。朝鮮、菲律賓、印度等國家有外國軍隊駐紮，她們的政府也在外國人的手裏，這是中國所沒有的情況。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也駐有外國軍隊，但這絕不是說這種制度普遍到全中國。中國有自己的行政機關，它並不是經常，尤其不能在所有的地區，都反對民族革命運動。這點聽起來好像奇怪，可是最近的事實就能證明。一九二五年的情況便是一個例子，像張作霖那樣反動透頂的軍閥竟然不得不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支持這個運動。

帝國主義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一九一九年）所發生的規模龐大的運動，主要是反對日本和親日的安福系政府。全國都捲入了這個最激烈的反政府的運動。各地大多數報紙都大聲疾呼「政府把中國賣給日本了」這個千真萬確的事實。人民大眾這時就覺悟到單靠抗議、單靠和平示威去反對親日的賣國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以前的各種運動（不論是一九一二或一九一四年開始的）都是帶有純粹和平性質。到一九一九年羣衆才滋長一種信念，認爲必須放棄和

平鬥爭，開展一個積極的，甚至可能是武裝的鬥爭。一九一九年的動盪情況應當看成是羣衆心境和羣衆運用的鬥爭方法的轉折點。

中國共產黨的形成

如果要確定中國共產黨的起源的日期，那末最準確的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我們所以選定這個日期是因爲在這年的五月四日，反日運動席捲了全國。運動發生的原因是，以段祺瑞爲首的安福系盤據了中央政府，正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出賣着國家。日本和他們訂立極端不利於中國的條約，這個條約規定將中國的最主要命脈的幾條鐵路歸日本掌握。條約的締結是和中國在凡爾賽會議上受侮辱同時發生的。這就激怒了中國青年，特別是學生們，因爲他們滿想戰後的中國是可以自由呼吸的。他們這時已經進入了「直接行動」的階段，但是不是有組織的，他們使用了暴力手段。他們痛打了中國駐日公使，並且攻打了幾個政府機關。在巴黎，中國學生還企圖刺死中國公使和交通系的首腦。這時局面異常緊張，羣衆性的積極的革命運動可以說是從此開始。這次運動的特點是：它開始是完全由學生領導，並且只有學生參加的，不久工人也加入了。在一九一九年的六月裏，北京、上海各地都不只是學生和知識階層，工人羣衆也關心起來，參加了運動。工人們這種新的階級覺悟表現在他們有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的要求。大約就在這個時期，在華北，北京和天津一帶地方出現了一種新組織，叫做「十人團」，是不超過十個工人的團體。從這裏可以看出工人們有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的強烈要求，但是發展得還不够，還不能組成一個政黨。

當時的中國革命者們正努力研究有關中國革命方向的各種學說，但是沒有人去計議或者從事實際工作。可是在一九一八年，陳獨秀（這時担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却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

他和幾個朋友在北京創辦「每週評論」，開始宣傳有關工人階級發展和成立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等問題。另外，又定期出版名叫「告北京人民」的一種傳單。他的活動進行不久，幾個月後就被捕入獄了。出獄後因為不能在北京繼續工作，他就到上海去參加戴季陶所出版的期刊工作。上海是個工業高度發展的城市，有大量的工人羣衆。當時中國既沒有工會，也沒有工人政黨，陳獨秀因此從事這兩方面的組織工作。到一九二〇年初，陳獨秀在上海集合了少數幾個人爲工人出版一種報紙，叫做「勞動界」，另一種專爲上海本地出版的，叫做「夥友」。在那時極端反動的情況之下，他們曾經用不同的方法去吸收年輕的革命者，他們在上海成立「外國語學校」，聚集了優秀的革命者，準備把他們分配在國內工作或以後派到蘇聯東方大學去學習。這個學校在一九二〇年大約有六十個學生，大多數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中國有的地方團比黨先成立，有的地方同時成立）。其中分配在國內工作的學生，在陳獨秀等人的指導下，形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基礎。他們首先在上海着手工會的組織，因爲上海當時還沒有工會。

最先組織成功的是機器工會，接着是印刷工會和紡織工會。從這裏可以看出工會組織是先在技術工人裏得到成功。然而困難是經常發生的。組織工會和進行其他工作都需要經費，但是簡直籌不到款。銷售「新青年」雜誌的收入是唯一的經費來源。

一九二〇年初，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組成了，到年中大約有七十個成員。這個小組在工人裏有很大的威信，它致力於組織和指導工人運動。道理很明顯，這個運動不能僅限於上海，如果僅限於上海的話，整個組織會很快的消滅掉。事實上也是如此，上海小組成立後不久，其他各大城市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在一九二〇年九月間，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了，組員八人，其中六個原是無政府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黃凌霜。另外兩個人是共產主義者，其中之一是李